

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路径 与机制研究^{*}

——基于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本土创业的纵向案例研究

刘玉焕 彭 洋 尹珏林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有研究多聚焦农业产业对乡村繁荣和振兴的带动作用,却忽略了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路径和机制。本文通过对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赋能乡村实现共同富裕过程的动态追踪,构建了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模型,深入剖析了非遗手艺人、地方政府、艺术高校和企业等多方主体的合作互动机制,提炼出“非遗功能属性产品化”“非遗创新属性产业化”“非遗大众属性生态化”3类本土创业路径,强调了“延伸型组织生存机会集”“聚焦型产业创新机会集”“开放型乡村发展机会集”在本土创业行动与乡村共同富裕之间的传导作用,系统刻画了非遗赋能乡村从个体富裕、群体富裕迈向共同富裕的动态轨迹。研究结论为乡村共同富裕的内生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洞见,同时对乡村依托非遗资源实现共同富裕亦有实践启示。

关键词:乡村共同富裕 非物质文化遗产 乡村本土创业 道明竹编

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5.0073

一、引言

乡村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极其艰巨和繁重的任务,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对全国乡村来说,要实现共同富裕既需要重视“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主导路径(王春光,2021),也需要摸索“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赋能路径(王泽宇等,2025)。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可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创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更有潜力激活乡村文化产业助力共同富裕(顾江等,2021;黄永林,2023)。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非遗传承和创造性转化问题,特别强调乡村是非遗资源的富集地^①,各地要高度重视挖掘和提炼非遗创新性发展在推进乡村共同富裕中的关键作用。2022年起,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等文件,鼓励各地积极探索非遗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当前,“非遗+文创”“非遗+旅游”“非遗+农业”等模式在乡村全面开花,但值得注意的是,非遗在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充满挑战,不少非遗陷入无人传承,无法创新产业化,以及难以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鉴于此,系统探究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和机制在当下极具迫切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是否对上述实践难题给出了答案?首先,乡村共同富裕研究侧重强调农业产业振兴路径的重要性,凸显以政府、科研院所和农业龙头企业等外部力量对农户的经济带动和帮扶作用(邢小强等,2021;刘小峰等,2023;朱竑等,2023),对部分乡村基于特色文化活动和非遗品牌实现共同富裕的现象缺少深入探讨与理论提炼(王泽宇等,2025)。其次,非遗研究多集中于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强调政府非遗保护与传承政策(丁元竹,2020)、新老手艺人的传承机制和认知更新机制(潘安成等,2023;维登等,2024)、手艺人高校、设计师等外界创意主体的共创机制(王兆峰、陈勤昌,2023;钟迪茜等,2025)以及非遗文化内涵挖掘和价值重塑行

收稿时间:2024-2-26;反馈外审意见时间:2024-4-24、2024-11-25;拟录用时间:2025-4-3。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本土创业视角下非遗赋能西部乡村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机制研究(24XGL013)”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建议。尹珏林为本文通讯作者。

动机(拉斐利等,2019;郭会斌等,2023),但较少系统分析非遗创新性发展对乡村经济和精神层面的双重赋能作用。综上,尽管现有研究分别强调了乡村共同富裕和非遗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性,然而遗憾的是,尚未将两者有机结合并从理论上揭示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机理,亦未能有效回应乡村共同富裕实践对非遗赋能的强烈需求。

鉴于此,本文选取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揭示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和机制。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的道明竹编至今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随着工业化发展曾陷入无以为继的发展困境,但自2008年起竹编手艺人开始本土创业,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审美结合,重获市场价值的同时与乡村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带动乡村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对道明竹编2008~2023年的发展历程进行纵向案例分析,本文发现,通过“非遗功能属性产品化”“非遗创新属性产业化”“非遗大众属性生态化”的关键产品和市场创新路径,乡村本土创业主体逐步构建了具有创新性和开放性的乡村发展机会集,推动乡村逐步从个体富裕、群体富裕走向共同富裕。本文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一是率先关注到乡村基于非遗资源实现共同富裕的文化赋能路径,这与农业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共同富裕的传统路径显著不同,并揭示了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机制;二是将非遗置于乡村共同富裕的宏观背景下讨论,拓展了非遗创新性发展的后果研究;三是深化了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机会集机制。虽然已有部分文献(徐凤增等,2021;周立等,2021)指出机会集的构建是乡村实现繁荣富裕的基础,本文进一步明晰了机会集构建的行动和后果机制,揭示非遗手艺人 and 农户逐步构建具有创新性和开放性的乡村发展机会集的动态过程和行动机制,以及不同类型机会集对乡村共同富裕的差异化作用。

二、文献回顾

(一)乡村共同富裕与产业振兴

乡村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既是国家乡村振兴实践中的难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对于乡村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决定性作用(张德海等,2020;王春光,2021)。不少研究指出国家制度设计和动员能力(罗必良等,2021)、企业帮扶和带动机制(吕鹏、刘学,2021)、集体经济发展(徐凤增等,2021)等是帮助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机制。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关注的产业背景几乎都是农业产业,少量关注乡村文旅产业(徐凤增等,2021;王心蕊等,2023),对于非遗能否以及如何赋能乡村共同富裕关注极少。

显然,现有基于农业产业振兴的研究结论无法揭示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机理,原因在于以下两点。一方面,非遗文化产业和农业产业在振兴路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非遗文化产业振兴以文化传承和产品创新为重(郭会斌等,2021;维登等,2024),而农业产业振兴更强调生产技术、产业布局 and 区域品牌塑造(刘小峰等,2023)。另一方面,农业产业振兴研究视角侧重强调企业、政府等外部力量对贫困农户的能力、资源和市场赋能(吕鹏、刘学,2021;邢小强等,2021),往往忽视了乡村本土创业力量的能动性。非遗发源于本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势必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黄永林,2023),以政府和企业为中心的外部视角难以揭示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内生机理。

(二)非遗创新性发展

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传统手工艺、口头文学、曲艺表演、传统民俗和体育等类型。推动非遗创新性发展是当前非遗研究的重点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探索。第一,强调非遗传承人的多样性。研究表明,老一代从业者对于传承非遗的历史文化至关重要,而新生代传承人的创新精神和认知对于非遗创新性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巴科、达尔皮亚兹,2022),同时政府、高校、企业等外部主体在非遗创新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王兆峰、陈勤昌,2023)。第二,凸显非遗创新行动的重要性。现有研究强调非遗产品构成元素和呈现方式的创新(坎切列里等,2022;陈龙,2023;维登等,2024),通过内涵挖掘、意义重塑、品牌打造等行动重塑非遗产品价值(拉斐利等,2019;郭咏

琳、周延凤,2021;潘安成等,2023),以及借助数字技术创新非遗产品的传播方式(王晓光、赵柯,2024)。第三,部分学者强调了非遗对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侧重从理论方面阐释非遗赋能乡村文旅产业繁荣发展的路径(黄永林、邹蓓,2024)。

然而,当前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探索。比如,现有研究虽强调非遗传承人与外部主体合作的重要性,但并未剖析多方主体的角色和互动机制。此外,现有研究侧重关注非遗产品生产和传播方式创新,忽视了非遗市场化创新行动,对于非遗产品创新能否获得市场认可,以及如何为非遗传承人带来更多创业机会缺少关注。更为重要的是,非遗作为乡村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关键文化资源,当前鲜有研究从过程视角出发,系统揭示非遗赋能乡村繁荣富裕的有效路径和内在机制。

(三)乡村本土创业、机会集与乡村共同富裕

乡村本土创业是指依托乡村独特的自然生态、农业产业、文化民俗、技能技艺等多样化资源,乡村个体或集体形式开展的创业活动(帕迪利亚-梅伦德斯等,2022;庄晋财等,2023)。通过企业经营,创业者不仅实现自身发展,还为乡村的共同繁荣富裕贡献力量(斯晓夫等,2020)。传统乡村本土创业研究主要聚焦于创业个体如何利用资源和网络实现自身发展(里克特,2019;雍旻等,2021)。然而,近年来,为了揭示乡村本土创业如何带动乡村实现共同繁荣富裕,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乡村个体创业向集体创业的转变过程(兰普金、巴克,2019)。研究表明,乡村本土创业推动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实现,是本土创业者、地方政府、农户和企业等多方主体从个体创业向集体创业动态演变的过程(卡拉米、里德,2021)。乡村中的“乡贤、能人”等少数本土创业者往往率先依托乡村本土资源开展个体创业,随后带动其他村民效仿并加入。在地方创业支持系统的扶持下,创业资源规模和种类逐渐丰富,创业主体之间的互动增多,进而催生出乡村创业机会集,产生以乡村社区发展为导向的集体企业(佩雷多、麦克莱恩,2013;徐凤增等,2021),推动乡村走向繁荣富裕。

现有研究强调,乡村本土创业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在于机会集的构建和利用。蔡莉等(2018)将其定义为以资源为基础,由多方主体互动开发的一系列机会的有机集合。事实上,机会集在创业领域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尤其缺乏对机会集的产生和动态演化过程的关注。此外,当前机会集研究侧重在商业创业领域,将其延伸到乡村创业情境,能够为理解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与内在机制提供新的视角与重要启示。

(四)理论缺口

综上,尽管现有研究已经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概念与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两大缺口。第一,当前共同富裕研究侧重关注乡村农业产业振兴路径,对非遗文化产业振兴路径关注不足。而非遗研究侧重传承与创新,未能将非遗嵌入乡村共同富裕宏观背景讨论。因此,现有研究结论既无法回应乡村共同富裕实践对非遗文化资源的强烈需求,也未能从理论层面揭示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机理。第二,乡村本土创业强调乡村集体创业与机会集构建的关键作用,这为本文理论构建提供了有益启示。然而,现有研究并未深入探讨非遗创业者如何通过多主体互动构建机会集,进而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与机制,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驱动力。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归纳式案例研究方法,原因在于:第一,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属于实践涌现的新现象,而归纳式案例研究方法适合从实践数据中提炼规律,构建理论观点,以推进对实践新现象的理解(尹,2013);第二,研究问题需要展现非遗手艺人、村民、地方政府、企业等多方主体的互动过程,而案例研究适合剖析复杂演化过程和多主体互动关系(王凤彬、张雪,2022)。

(二)案例选择

本研究案例选择依据以下“理论抽样”原则:一是非遗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具有较好的成果;二是非遗对周边地区共同富裕的带动作用明显;三是非遗创业创新活动较为突出。据此,研究团队自2019年起对道明竹编、藏羌织绣、彭州白瓷等非遗项目进行调研,根据比较分析,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非遗“道

明竹编”作为研究对象。

道明镇位于成都市崇州市西北部,辖11个村3个社区,户籍人口约4.9万人。在20世纪70、80年代的鼎盛时期,全镇超80%的人从事专业竹编,道明镇更享有“川西竹编第一市场、中国民间艺术(竹编)之乡”的美誉。然而,随着工业化生活用品的普及,竹编产业逐渐衰退,面临发展困境。2008年起,在新生代传承人、手艺人、地方政府、艺术高校、村民的共同努力下,道明竹编成功转型升级为创意文化产业,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以此为主题打造了“道明竹艺村”。详细的竹编创新产品和乡村文旅业态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附图1。2022年,道明竹艺村被评为全国首批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当地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不足1万元增加到2022年的约4万元,乡村共同富裕初见成效。

(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数据收集方法以访谈数据为主,二手数据和现场观察作为补充,数据之间相互补充交叉验证,确保研究案例的信度和效度。所获数据如表1所示。(1)访谈数据。研究团队分别于2020年8月、2021年4月、2022年7月、2023年8月、2024年5月先后5次到道明竹艺村进行调研,对新生代非遗传承人和老手艺人、道明竹艺村运营方崇州文旅集团管理层、地方政府、本地新老村民等33人进行了面对面访谈,获取了道明竹编发展的历史以及转型升级的过程和效果数据。(2)现场观察。研究团队在竹艺村驻村观察5天,体验了文旅业态,与当地消费者和经营者进行互动交流,获得了真实可靠的观察和体验数据。(3)档案数据。本研究收集了行业报告、媒体报道、视频纪录片等二手资料,进一步补充和交叉验证了访谈数据和观察数据。

(四)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乔亚等(2013)的结构化数据处理方式,对访谈数据多层次编码提炼构念,建立构念之间的关系,直到涌现出理论框架。本文数据分析包括以下3个步骤。

首先,梳理道明竹编赋能乡村发展的时间脉络,识别关键事件,归纳案例的3个发展阶段:一是非遗个体创业阶段(2008~2012年),即少数新生代传承人以创业形式开始道明竹编传承创新,为个体企业发展开拓机会;二是非遗产业创业阶段(2013~2016年),即竹编手艺人 在地方政府和艺术院校的支持下跨界创新,重塑竹编市场价值,推动道明竹编产业转型升级;三是非遗乡村融合阶段(2017年至今),即手艺人、村民、地方政府和文旅企业共同将道明竹编与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带动乡村走向共同富裕。

其次,采用 双盲方式对数据编码提炼,形成理论构念。首先,通过开放式编码,对数据进行循环比较,聚焦于乡村本土创业者的可观测行动以及产生的结果。例如,新生代传承人创业后第一件事是学习和整理传统竹编纹样,形成竹编技艺数据库,本文将此行动归纳为一阶类别“竹编技艺整理”,类似地,本文共归纳出41个一阶编码。其次,以一阶编码为基础,反复地将数据、涌现出的主题以及文献循环迭代处理,识别出更具有理论性的二阶构念。例如,本文将“创新产品应用场景”和“创新产品呈现方式”两个一阶类别归纳为“创新产品类别”二阶构念。类似地,经过反复比较迭代最终归纳出21个二阶构念。

最后,侧重聚合理论维度,构建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模型。本文将相关二阶构念进行聚合,在本土创业行动、机会集和乡村富裕水平三方面形成7个理论维度,形成数据结构图(详见图1)。为了确保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度,作者将涌现出的理论构念和过程模型分享给实践者进行反复讨论,基于反馈不断对理论框架进行迭代调整。

四、案例分析

(一)非遗个体创业阶段(2008~2012年)

道明竹编以立体竹编为主,产品涵盖生活类用品、安全帽、开业花篮、产品包装盒等,曾是道明镇的支柱产

表1 案例数据来源

数据形式	数据对象	有效字数	编码
访谈数据	新生代非遗传承人5人,老手艺人3人,共8人	20.4万字	A1~A8
	崇州文旅集团董事长、运营总监、营销总监等3人	5.8万字	B1~B3
	四川非遗中心和崇州文旅局相关领导等4人	1.8万字	C1~C4
	竹艺村党委书记、集体经济企业负责人等2人	2.8万字	D1~D2
	中央美术学院老师和学生等3人	0.6万字	E1~E3
二手数据	本地村民8人、新村民5人,共13人	11.6万字	F1~F13
	行业报告、媒体报道等	32篇	J1
	央视节目、纪录片等	12个	J2
参与式观察	驻村体验观察(5天)	2.4万字	H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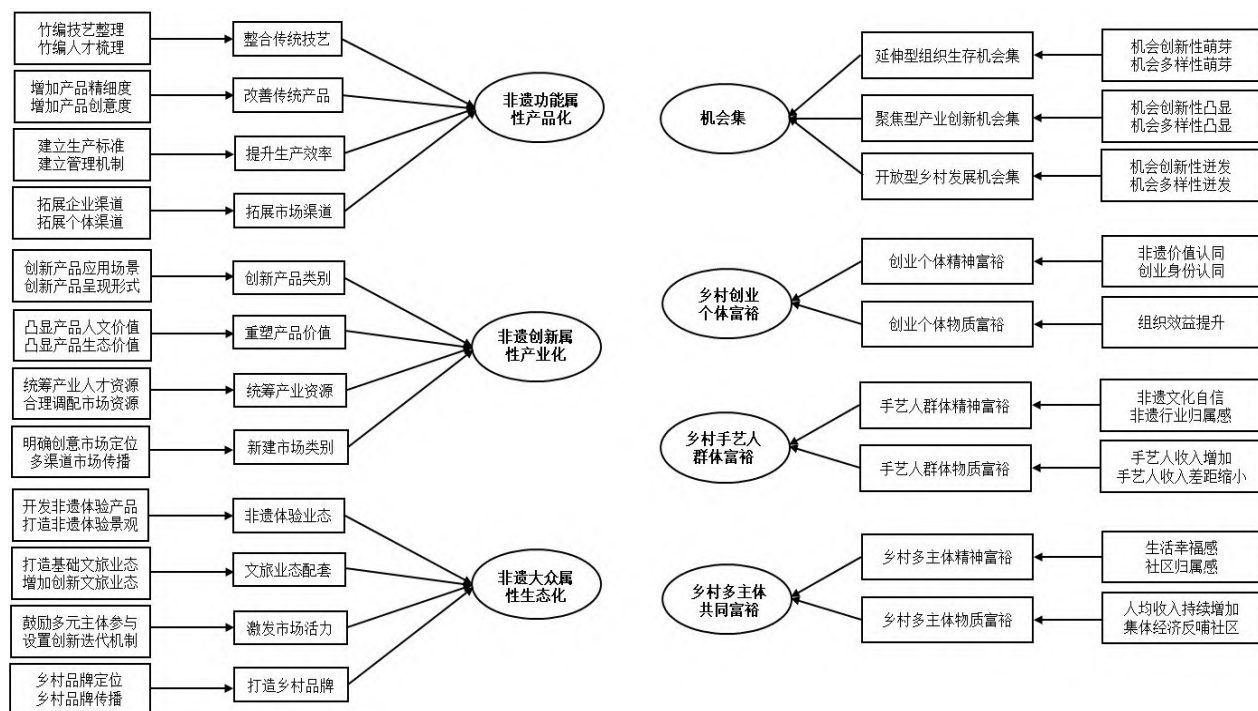


图1 数据分析结构图

业。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工业化生活用品的普及,市场需求锐减,大量手艺人因无法维持生计而退出,竹编产业逐渐衰退。2008年起,4位新生代传承人以传承家族技艺为目标开启非遗个体创业阶段,其中A1家中三代从事竹编,A2的父亲为省级非遗传承人,A3和A4的父母亦从事竹编技艺。

本阶段中,新生代传承人独立探索竹编技艺的传承与创新,试图提升家族竹编工厂的生存能力。地方政府、外部企业、艺术高校学生

及竹编老手艺人等多元主体为其提供了松散的创业支持。比如,政府通过授予非遗传承人身份,认可并支持其创业行动;外部企业需求方和艺术高校学生则因自身需求主动与新生代传承人合作,提供零散创新想法;竹编老手艺人与传承人频繁交流,为其提供技艺资源支持。在本阶段,新生代传承人主要通过“继承非遗技艺”“延伸现有市场”两类本土创业行动,将非遗功能属性产品化,构建了延伸型组织生存机会集,为非遗创业个体的物质和精神富裕打下了基础(详见表2)。

1. 非遗本土创业行动

(1) 继承非遗技艺。继承非遗技艺是指对传统竹编技艺进行挖掘、整合、改善,使其产品重新融入现代生

表2 非遗个体创业阶段的编码与证据展示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相关引文与证据
本土创业行动		
整合传统技艺	竹编技艺整理	学习和整理竹编纹样,形成竹编技艺纹样库,对竹编技艺保护和继承(A2,A7)。
	竹编人才梳理	梳理几百位老手艺人,对他们的竹编技艺进行摸底与分类(A1);妇女和残疾人心细,坐得住,对他们进行培训(A6)。
改善传统产品	增加产品精细度	道明竹编以开业花篮、生活用品为主,不够精细,瓷胎竹编精细化要求很高(A4)。
	增加产品创意度	跟酒店合作,大家一起讨论做出产品很有创意(A1);学生找到我们做毕业设计,他们注重创意(A2)。
提升生产效率	建立生产标准	对制作工艺梳理简化,删去传统工艺的过度精细化,在竹材处理环节实现了半自动化(A1);明确产品编制标准,让成品尽可能保持一个水准(A3)。
	建立管理机制	平时工作室就20个人,但是可以根据需要召集100多个老师傅(A2)。老师傅传帮带培训员工,降低运营成本,注重培养年轻人(A4)。
拓展市场渠道	拓展企业渠道	每年郫县豆瓣定向采购大量竹篮,利润就几分钱,但是带动性很大(A1,A3)。
	拓展个体渠道	在淘宝上开店,拓展消费者渠道(A1);参加博览会,展示道明竹编产品(A2)。
机会集特征		
延伸型组织生存机会集	机会创新性萌芽	了解客户需求后,自己琢磨如何创新,发现竹编技法有创新空间(A1,A3);尝试大地景观艺术装置,虽然作品简陋,但包含创新思维(A2)。
	机会多样性萌芽	酒店邀请我们去用竹子给大厅进行装饰,效果很好(A1);以前做花篮产品较多,现在瓷胎竹编和创意竹编都涉及(A3)。
乡村富裕水平		
创业个体精神富裕	非遗价值认同	虽然家里一直从事竹编,但创业后对竹编更有感情,希望能传承下去(A1,A4)。
	创业身份认同	从小觉得竹编又累又不赚钱,创业后发现找准市场才是出路(A2);创业为了帮妈妈维持生意,结果发现我可以竹编变得更好(A3)。
创业个体物质富裕	组织效益提升	我接手后从个体户转变为企业,多方位拓展业务,尽量增加企业收入(A1)。

活,主要包括:整合传统技艺,即将分散化的竹编技艺知识和技能系统化梳理和整合;改善传统产品,即对传统竹编产品进行适度改善提升,增加产品精细度和艺术感,提升产品吸引力。

整合传统技艺。道明竹编虽然有2000多年历史,但基本靠手艺人人口口相传,鲜有系统化的技艺整理。为了整合传统竹编技艺,4位新生代传承人通过对该竹编技艺和手艺人资源进行挖掘和梳理,推动技艺传承的系统化。在竹编技艺方面,通过梳理历年技法样式,建立道明竹编纹样库,并通过拜师学艺掌握核心技法,为后续产品改善奠定技术基础。在人才整合方面,新生代传承人逐一走访留守老手艺人,记录其技术能力和需求,形成竹编人才分类分级数据库。同时,通过培训乡村妇女和残疾人,构建竹编传承人才梯队库。

改善传统产品。为了提升道明竹编产品的吸引力,新生代传承人尝试通过增加产品精细度和创意感来对传统竹编产品进行改善提升。在精细化提升方面,针对传统竹编产品(如安全帽、开业花篮)用料粗糙、附加值低的问题,传承人优化材料选择与编制工艺,聚焦“瓷胎竹编”等高端产品,打造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在创意设计方面,通过与企业 and 设计专业学生合作,探索创新竹编产品设计。例如,与酒店合作开发竹编墙面、屋顶及装饰方案,与艺术高校学生合作设计创意竹编作品,结合现代需求提升竹编产品的实用性与艺术价值(A1)。

(2)延伸现有市场。延伸现有市场是指通过提升市场供应能力和拓展产品销售渠道,拓展延伸竹编市场覆盖范围,增加企业生存机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提升生产效率,即通过现代化企业生产和管理方式在保证竹编手工价值的同时提升生产效率,稳定市场供应量;拓展市场渠道,即通过开拓数字平台、博览会、出口等多元化市场渠道,拓展产品销售渠道。

提升生产效率。针对竹编产品产量低、耗时长、品质不稳定等问题,新生代传承人通过规范生产流程和完善管理机制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例如,通过引入数控剖竹机设备提升竹材加工和处理的效率和品质,为精细化瓷胎竹编提供优质原材料;通过制定产品编织标准,培训手艺人提高技艺水平,稳定产品质量;沿用家族作坊的灵活用工模式,手艺人可灵活兼顾农活与竹编工作,在项目需求时扩大生产规模。

拓展市场渠道。为了增加竹编产品的销量,新生代传承人积极拓展企业合作渠道和个体消费渠道,帮助道明竹编提升可见性和认可度。一方面,新生代传承人积极对接企业合作渠道,形成长期稳固合作关系,如为郫县豆瓣企业提供包装盒,通过大规模订单维持手艺人生活。受访者强调:“我们跟郫县豆瓣企业合作包装盒,一个产品利润只有几分钱,但是一年几十万产品,可以养活几百个手艺人”(A1)。另一方面,新生代传承人积极探索电商平台(如淘宝店)、非遗博览会等渠道,结合现场技艺展示吸引消费者关注,提升市场认知度。

2. 延伸型组织生存机会集

在效率逻辑驱动下,新生代传承人以非遗功能性产品化为核心,逐步构建了延伸型组织生存机会集,其特点表现为机会创新性和多样性的初步萌芽。具体来讲,机会创新性萌芽体现在道明竹编从传统的花篮和包装产品机会向瓷胎竹编机会和创意竹编机会转变,新生代传承人开始探索竹编创新创意型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机会多样性萌芽体现在道明竹编逐步突破传统生活用品边界,与现代艺术结合,探索实用功能属性以外的艺术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新生代传承人创业行动仍以分散探索为主,未形成集体合力,产品创新范围和深度较为有限,市场仍以传统产品为主,因此机会创新性和多样性尚处于较低水平。

3. 少数非遗创业个体富裕

延伸型组织生存机会集的构建使少数非遗创业个体通过市场机制成功传承竹编技艺,实现了乡村个体的物质和精神富裕。一方面,非遗创业显著提升了经济收益。相较于传统家族作坊难以维持生计的状况,创业后收入大幅增长。据受访者(A4)介绍,原有家庭作坊仅能维持生计,但是创业后年收入达到50万元以上。另一方面,新生代传承人在创业过程中建立非遗价值认同和创业身份认同。其中,非遗价值认同是指新生代传承人逐渐认识到道明竹编的文化和技艺价值。如受访者强调:“从小跟竹编打交道,但在跟手艺人 and 外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才真正体会到非遗技艺的价值”(A1)。创业身份认同体现为传承人从早期对父辈技艺的不理解和对非遗传承的怀疑,转变为坚信市场化是传承家族技艺的最佳路径,逐步形成对创业身份的认可与坚持。

(二)非遗产业创业阶段(2013~2016年)

在非遗个体创业阶段,新生代传承人逐渐意识到产品系统化创新是道明竹编实现产业化的关键,通过与地方政府、艺术高校等外部主体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推动竹编进入产业集体创业阶段。本阶段,创业主体从少数新生代传承人拓展到更广泛的竹编手艺人团体。手艺人不再是竹编技艺的被动提供者,而是以创业者身份主动参与产品创新与市场开拓,成为集体创业的重要推动者。

同时,多元主体的合作关系也由松散协作转向高度紧密合作。具体来讲,地方政府不仅为手艺人提供身份背书,还整合跨界创新资源搭建产业创新平台。比如,崇州市和道明镇政府积极与中央美术学院、上海美术学院等共建人才培养基地,支持手艺人进修学习,同时鼓励高校学生与手艺人联合开发创意产品。此外,道明镇与国家竹产业研究院、澳大利亚竹产业研究院及40余家文创设计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多方主体支持下,手艺人通过“创新非遗价值”和“开拓全新市场”开展本土创业行动,推动非遗创新属性产业化,构建聚焦型产业创新机会集,为竹编手艺人的物质和精神富裕奠定基础(详见表3)。

1.本土创业行动

(1)创新非遗价值。创新非遗价值是指通过对竹编产品功能和文化价值进行创新,使其以全新形式融入现代生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创新产品类别——将竹编产品从传统生活用品转型为创意文化产品,且应用功能从生活功能延展至艺术审美功能;重塑产品价值——将竹编从功能性产品转型为集艺术、人文和生态价值的文化产品。

创新产品类别。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指导下,手艺人开发了用于公共空间(田野、公园、商场)的艺术装置类产品、提升生活品质的创意家居产品(灯具、装饰品)。此外,道明竹编手艺人还开发了平安扣、创意耳环、胸针、创意铃铛等小型饰品,满足消费者对竹编文化美好寓意的需求。针对产品表达形式,手艺人打破传统竹编造型对称性的限制,强化非对称性与创新性,通过结构设计、色彩搭配及材料组合提升产品艺术性和互动性。

重塑产品价值。手艺人在设计和宣传竹编产品时侧重从艺术人文和生态价值两方面凸显产品价值内涵,改变了大众对于道明竹编的原有认知。一方面,手艺人通过故事讲述与艺术氛围营造,增强产品的文化内涵和消费者认同感。据受访人介绍:“跟奢侈品牌合作时,会通过故事讲述和艺术氛围打造凸显道明竹编的艺术人文价值”(A1)。另一方面,手艺人在产品设计和打造的过程中强调竹编产品的生态价值,将竹编融入自然

表3 非遗产业创业阶段的编码与证据展示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相关引文与证据
本土创业行动		
创新产品类别	创新产品应用场景	道明竹编从“生活功能”拓展到“艺术功能”,让大家在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和娱乐场景等感受道明竹编的自然、人文和艺术之美(E1,E2)。
	创新产品呈现形式	产品呈现方式发生很大改变,增加了艺术性表达,比如在颜色、线条、流动性、多种材质搭配、产品大小等方面上增加艺术美感(A1,H1)。
重塑产品价值	凸显产品人文价值	道明竹编是传统文化技艺的结晶,我们通过产品和故事让消费者感受到人文艺术价值(A1)。
	凸显产品生态价值	重点突出自然与竹子的和谐,体现竹子的生态价值(A2);在竹编材料和技艺上保持原生态,体现生态价值(A7)。
统筹产业资源	统筹产业人才资源	镇上成立了竹编协会,竹编合作社,目的是整合道明竹编产业资源,促进竹编产业抱团发展(A1,D2)。
	合理调配市场资源	竹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平台企业,统一对外承接市场需求,也对大订单在多个合作社之间合理调配(D1)。
新建市场类别	明确创意市场定位	道明不具备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更适合走创意文化路线(C1,D1);道明竹编特色是创新、创意和文化,这是核心优势(A2)。
	多渠道市场传播	我们在小红书、抖音等数字平台进行产品传播(A1,H1);我们参加各种文化展示、创意设计、艺术展览的活动(A3)。
机会集特征		
聚焦型产业创新机会集	机会创新性凸显	道明竹编在设计理念、艺术设计、文化表达方面都很创新(A2,C1);几年时间整个产业活过来了,创新是关键(E1,E2)。
	机会多样性凸显	道明竹编与很多行业共创,发展机会变多了(A7,A8);有的看重非遗文化属性,有的看重生态自然属性,有的看重艺术创意属性(A1,A2)。
乡村富裕水平		
手艺人团体精神富裕	非遗文化自信	手艺人精气神完全不一样,每天乐呵呵,对手艺人身份感到非常自豪(A6,H1);竹编是老祖宗们传下来的财富,我们很自豪(A8,J2)。
	非遗行业归属感	我发自内心热爱竹编,有信心带领产业重新走向市场(A3);感觉又回到20世纪70、80年代,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推动道明竹编发展(A5)。
手艺人团体物质富裕	手艺人收入增加	手艺人以前挣不到钱,现在一个艺术装置几十万,手艺人收入明显增加了(A2)。
	手艺人收入差距平衡	竹编合作社带动手艺人一起参与,不会亏待他们(A1);竹艺产业公司对大订单统一调配,大家都有收益(D1)。

环境,彰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哲学。据品牌合作方介绍:“通过触摸道明竹编原生态作品,消费者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力量”(H1)。

(2)开拓全新市场。开拓全新市场是指通过聚合产业资源与重新定位市场,培育新的细分市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统筹产业资源——即聚合产业人才和品牌资源,统一应对市场需求;新建市场类别——即重新调整竹编产品市场定位和目标用户,确定新的细分市场。

统筹产业资源。道明镇政府鼓励手艺人团体成立了多个竹编合作社和竹编协会,整合分散的手艺人,为产业发展注入集体合力。竹编协会统一举办竹编技艺培训,发布产业标准,推动道明竹编产业形成统一的地理标志品牌。竹编合作社以“新生代非遗传承人+手艺人”的方式共同面对市场需求,形成集体创新意识和能力。此外,道明镇成立了集体企业“四川道明竹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统筹品牌宣传,并通过订单调配机制为各合作社提供生存保障,优化资源分配和业务聚焦。

新建市场类别。随着道明竹编产品的不断创新,其市场类别不断聚焦,最终定位于“创意竹编市场”,聚焦“手工、创意和文化”特色,区别于传统手工市场和工业化产品市场。如地方政府人员介绍:“我们考察全国各地竹编市场,发现要么偏向传统手工市场,要么偏向工业化制品,而我们要做的是个独特的新市场”(D1)。为了凸显创意竹编市场类别,手艺人市场传播上采取多渠道创意输出,通过在抖音、小红书、快手等数字平台上展示创意视频或直播互动,提升消费者对道明竹编创意性与文化性的认知。同时,政府也组织手艺人参加艺术博览会、非遗博览会以及国内外文化艺术交流等活动,通过手工体验展现道明竹编的文化创意属性,加深消费者对这一新型类别的品牌认知。

2. 机会集特征:聚焦型产业创新机会集

本阶段中,本地手艺人政府和艺术高校等外部力量的支持下,重塑道明竹编产业,构建了聚焦型产业创新机会集,呈现产业发展机会创新性和多样性凸显的特征。具体来讲,机会创新性体现在道明竹编从传统竹篮与生活制品转型为创意竹编,创新型产品机会显著增加,如公共艺术装置、创意玩偶、竹编饰品(耳环、胸针、平安扣)以及创新家居产品。据中央美术学院老师介绍:“道明竹编产品创新在全国都极具特色,创新拯救了道明竹编产业”(E1)。在机会多样性方面,道明竹编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非遗文化符号,具备产品开发、文化传播和体验疗愈等多元价值。此外,与奢侈品牌、大众品牌的跨界合作,进一步拓展了竹编与其他行业共创的可能性,加速产业机会多样化。

3. 手艺人团体富裕

聚焦型产业创新机会集的构建为手艺人提供了创新性和多样性的创业机会,手艺人团体利用机会实现物质和精神富裕。在物质富裕方面,随着道明竹编产业发展机会变多,手艺人团体收入普遍明显增加。案例证据显示:在当地竹编企业中,年收入数百万元的企业超过十家,带动大批手艺人增收。成熟手艺人年收入可达十多万元,普通手艺人收入也远超产业发展前水平。合作社机制有效缩小手艺人团体间的收入差距。新生代传承人专注市场拓展与品牌建设,老手艺人则发挥技艺专长,双方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富裕。最后,竹艺产业公司通过订单协调平衡不同合作社间收入,进一步助力手艺人团体实现经济富裕。

在精神富裕方面,手艺人团体在产业创新过程中建立了非遗文化自信和行业归属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非遗文化自信表现为手艺人道明竹编非遗技艺的认可和自豪感显著增强,竹编技艺从谋生手段转变为引以为豪的非遗艺术。如老手艺人表示:“手艺人以前就是普通的‘篾匠’,但现在是非遗传承人”(A6)。行业归属感表现为手艺人感受到竹编产业的蓬勃发展和集体奋斗的乐趣。正如道明竹艺村书记表示:“家家户户重新从事竹编,一起谋划发展前景,共同奋斗”(D1)。

(三)非遗乡村融合阶段(2017年至今)

随着道明竹编产业成功转型,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促进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积极与当地文旅企业、艺术高校、手艺人、新老村民等多元主体建立高效协同机制,共同筹建和运营“道明竹艺村”,推动道明竹编进入非遗乡村融合阶段。

本阶段创业主体从手艺人拓展至手艺人、本地村民和外来创业者的多元主体,地方政府、艺术高校和文旅企业通过资源提供、产品创新和创业孵化等多方面赋能。在政府支持方面,崇州市政府投入资金改造竹艺村周边物理环境,以满足旅游景区标准,同时村委动员村民参与土地流转、房屋改造和搬迁等工作,推动乡村文旅发展。与此同时,道明镇政府与艺术高校和外部文旅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为其融入乡村提供政策支持。在院校互动方面,艺术高校与手艺人逐步形成双向创新互动,不仅提供设计支持,还将手艺实践融入高校人才培养。最后,崇州文旅集团为手艺人及新老村民提供创业培训与孵化支持,鼓励基于竹编非遗与生态资源的文旅创业。

在多方主体的高度协同下,竹编手艺人、新老村民共同通过“非遗乡村融入”和“创造多元市场”两类本土创业行动,将非遗大众属性生态化,促使机会集向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多样性的乡村发展机会集演变,为全体村民实现精神和物质富裕提供条件。具体案例证据示例如表4所示。

1. 本土创业行动

(1)非遗乡村融合。非遗乡村融合是指将道明竹编非遗特色与乡村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形成非遗体验与文旅配套的完整业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非遗体验业态——即通过开发非遗体验产品和打造非遗文化景观等方式实现非遗在乡村的全方位体验;文旅业态配套——即规划设计与竹编非遗业态相互配套的基础和创新业态。

非遗体验业态。为了增强游客对道明竹编非遗技艺的体验,道明镇政府鼓励手艺人开设工作室,目前已有十多位手艺人开设工作室,开发出竹扇、平安扣、竹篮、竹铃铛、竹耳环等一系列体验产品,部分工作室提供竹编研学、疗愈等体验课程。此外,竹艺村打造多个创意景观,成为文化网红打卡点。比如,崇州文旅联合手艺人、艺术高校共同打造出“竹里”民宿,极具川西民居特色,成为竹建筑文化景观地标。同时竹艺村内还开设竹编博物馆、科普园等文化场所,丰富了消费者的文化体验。

文旅业态配套。文旅业态配套主要从两方面开展:一是建设符合4A级景区标准的基础文旅服务业态,同时凸显竹编非遗特色,比如,在打造景区内生态环境时,复现传统川西林盘特色,打造“竹林绕房”的民居景观;二是充分发动手艺人、本地村民和外来创业者的创新动力,深入挖掘本地文化和自然资源,持续迭代文旅创新业态。2022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打造出结合竹子生态资源和竹编文化资源的竹艺公园,丰富了消费者的旅游体验。

(2)创造多元市场。创造多元市场是指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利用乡村文化和自然资源积极探索,激发市场活力与品牌效应。激发市场活力指的是通过参与和迭代机制激发多元市场主体的创业活力,增强乡村市场竞

表4 非遗乡村融合阶段的编码与证据展示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典型证据援引
本土创业行动		
非遗体验业态	开发非遗体验产品	传承人在工作室展示竹编产品,提供竹编体验活动(A1);村里建有竹文化博物馆、竹文化科普园(D1)。
	打造非遗体验景观	我们有竹文化特色的民宿“竹里”,有竹编大熊猫,还有竹编艺术装置,以及竹编博物馆(A2,B1)。
文旅业态配套	打造基础文旅业态	建设初期首先保障基本的文旅业态,包括游客停车服务、环境卫生服务、不同层次的餐饮住宿业态(C2,D1)。
	增加创新文旅业态	现在增加文旅的创新服务业态,包括提供露营服务、节庆活动,打造全新竹艺公园等,提供创新旅游服务(B1)。
激发市场活力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	邀请新村民参与进来,鼓励本地手艺人、村民创业,提供差异化服务(B3)。
	设置创新迭代机制	对各业态发展情况摸底,经营不善的业态督促他们改善服务,更新业态(B1)。
打造乡村品牌	乡村品牌定位	以前叫“龙黄村”,我们改名“道明竹艺村”,体现艺术竹编特色(D1);竹艺村品牌特色就是非遗和自然生态(C2)。
	乡村品牌传播	政府引导乡村品牌传播,参加央视节目和博览会,接受媒体报道等(D1);村里的每一个人在数字平台上都是传播者(F11)。
机会集特征		
开放型乡村发展机会集	机会创新性迸发	我们跟不同组织碰撞融合,创造出很多创意产品(A2,A4);非遗赋能后衍生出竹编特色的创新文旅业态(B2,B3)。
	机会多样性迸发	竹艺村和周边地区汇聚了多种业态,包括非遗体验、农事研学、文化科普、低空飞行、民宿、餐饮等项目等(A2,B1)。
乡村富裕水平		
乡村多主体精神富裕	生活幸福感	很多人来旅游,羡慕我们的生活,幸福生活指数高(F1,F3);从城里回来是因为这里有发展机会,生活和事业能够平衡(F5)。
	社区归属感	大家聚到一起共同为村里的事情出谋划策,凝聚力量(D1);竹艺村很多社区经济和文化活动,让大家聚到一起,共同发展(B1)。
乡村多主体物质富裕	人均收入持续增加	很多人回来创业,收入来源增多了,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4万元(D1,F4)。
	集体经济反哺社区	集体经济每年10%利润用于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救助,带动他们一起奔小康(D1)。

争动力;打造乡村品牌即通过品牌定位和传播打造统一的乡村品牌,增强乡村市场竞争优势。

激发市场活力。道明镇政府通过资金补贴、场地支持等措施,鼓励手艺人 and 新老村民共同创业,并邀请崇州文旅集团对本地村民和外来创业者进行培训孵化,增加乡村文旅创新业态。除此之外,道明竹艺村还设置了业态创新迭代机制,每个月村里所有业态集合讨论分享各自创新经验,动态引进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业态,激发创业主体的创新动力。

打造乡村品牌。道明镇以“道明竹艺村”品牌为核心,通过政府资源和数字平台宣传乡村特色,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在乡村品牌传播方面,竹艺村采取两方面传播策略:一方面借助政府资源,鼓励本土创业者积极参加乡村品牌宣传活动,如中央电视台《非遗里的中国》《山水间的家》《青春手艺人》等节目录制,与中央美术学院共同拍摄道明竹编和竹艺村纪录片等;另一方面鼓励当地村民和创业者利用抖音、快手等数字平台进行乡村活动传播和故事讲述,增加乡村品牌认知度。

2. 机会集特征:开放型乡村发展机会集

本阶段中,在地方政府、艺术高校和合作文旅企业的高度协同下,竹编手艺人、本地村民和外来创业者合作共创将非遗大众属性生态化,实现非遗与乡村的融合发展,构建了开放型乡村发展机会集,为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条件。具体来讲,开放型乡村发展机会集的特征是机会创新性和多样性迸发,不同创业主体均可以利用和开发机会推动乡村多元化发展。

机会创新性迸发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道明竹编非遗品牌影响力增加,与其他组织合作机会越来越多,创新性产品开发机会显著增加;另一方面,道明竹艺村因融入竹编非遗特色而使其服务与其他乡村文旅业态差异化,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机会多样性表现为手艺人、村民和外来创业者等多元主体均可参与多样化业态。比如,道明竹艺村景区内及其周边既有外来创业者开设的高品质住宿、餐饮、露营、乡村音乐节、农事体验、创意农业等新业态,也有本地村民开设的农家乐、农产品销售、住宿等传统业态,更有竹编手艺人开设的非遗研学、非遗疗愈、非遗市集等文化业态。多样化业态相互搭配,促进了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现了乡村发展机会的多样性。

3. 乡村多主体共同富裕

开放型乡村发展机会集的构建为乡村发展带来了创新性和多样性机会,推动全体村民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初步实现共同富裕。在物质富裕方面,手艺人团体在乡村情境下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收入水平持续升高。2023年当地竹产业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竹艺村旅游收入近5000万元,当地村民每年土地转让费用、家门口就业创业收入、集体经济分红等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元。除此之外,道明竹艺村集体经济共享机制平衡了不同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如,竹艺村集体经济每年拿出10%的利润帮扶弱势群体、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物质共同富裕。

在精神富裕方面,全体村民生活幸福感和社区归属感极大增强,真正实现了家门口的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感的提升主要来源于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据当地村民介绍:“以前都是出去打工,现在就在家门口就业和创业,生活工作可以平衡”(F1)。此外,当地新老村民还感受到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共同关心竹艺村发展,显示出强烈的集体意识。当地新村民提到:“我们通过社区集体活动把新老村民融合在一起,大家共同关心竹艺村发展,凝聚力很强”(F5)。

(四)案例分析总结

基于上述案例分析,本文构建了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演进模型(如图2所示)。案例表明,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复杂过程,涉及非遗个体创业、非遗产业创业和非遗乡村融合3个阶段,其核心在于从个体创业向多元主体协同的乡村集体创业的转变。

非遗个体创业阶段以少数新生代传承人为主要创业者,创业活动以延续非遗技艺为目标,政府和高校的支持较为松散,机会集相对封闭,仅实现传承人的物质与精神富裕。非遗产业创业阶段,地方政府与艺术高校共建非遗跨界创新平台,为手艺人团体提供系统化支持。此时,本土创业主体为竹编手艺人团体,通过跨界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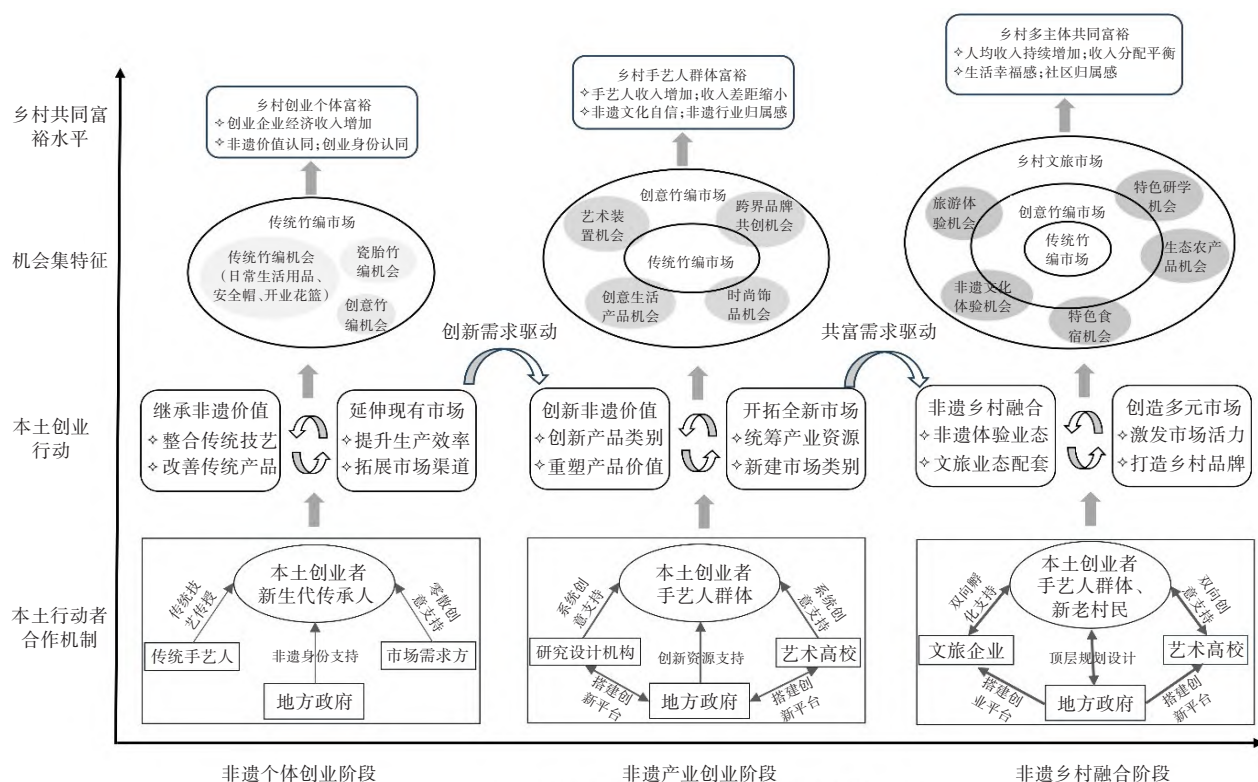


图2 非遗赋能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过程模型

注：机会集特征：○颜色越深代表机会创新性越高，机会类别越多代表机会多样性更丰富；本土行动者合作机制：→越粗代表合作关系越密切。

新构建具有丰富性和创新性的非遗产业机会集，推动手艺人实现物质和精神富裕。非遗乡村融合阶段，崇州市政府通过艺术高校、文旅企业、本地村民和外来创业者等多方主体建立高效协同机制，推动道明竹编与乡村文旅的深度融合。创业主体扩展至手艺人、本地村民、外来创业者和文旅企业等，带来更多创新资源，构建出开放且充满创新活力的乡村发展机会集，为乡村所有群体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支撑。

五、进一步讨论

（一）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机制

通过对道明竹编赋能乡村发展的案例分析，本文构建了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机制模型（如图3所示）。首先，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实现自身生存发展，而大部分非遗生存艰难的原因在于非遗技艺形成于早期经济社会，其功能属性难以满足当前社会需求（黄永林，2023）。非遗功能属性产品化路径是改善和创新非遗实用功能，延伸非遗生存发展的机会。本路径中，产品导向创业行动侧重继承和改善传统非遗产品，打造符合现代市场需求的产品与服务（韩若冰，2019）；市场导向创业行动侧重提升生产效率和增加市场渠道。这一路径主要依赖政府和高校的松散支持，为非遗创业个体提供身份和创意支持，激活其内生动力。值得一提的是，本路径助力新生代传承人实现精神和物质富裕，使其从传统“篾匠”转变为乡村“能人”，发挥创业示范作用，为后续非遗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基础。

其次，非遗创新属性是指非遗产品既传承历史文化，又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确保产品和服务融入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丁元竹，2020；安学斌，2021）。实现个别非遗产品创新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实现非遗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和创新性发展（黄永林，2023）。非遗创新属性产业化路径是指实现从个体创业到产业集体创业的跃迁（克罗森、赫根斯，2019），推动非遗从传统手工产业向新型文化产业转型。本路径中，产品导向创业行动是创造非遗价值，凸显非遗产品的文化、艺术和生态价值，市场导向创业行动侧重统筹产业资源，开辟创意文化市场新类别。两类行动共同构建产业创新机会集，显著提升竹编产业发展机会的创新性和多样性，手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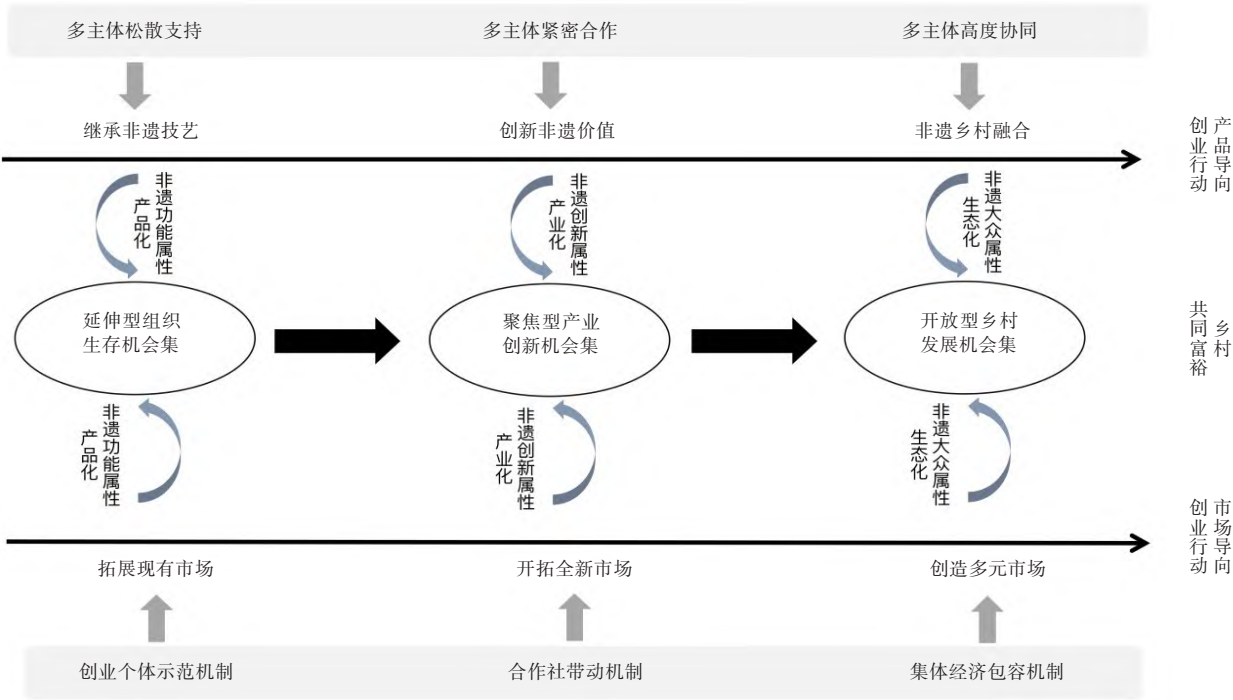


图3 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路径与机制

体由此实现经济和精神富裕。该路径的成功实施取决于两个关键机制：一是多主体紧密合作机制，即地方政府、艺术高校和企业发挥创业支持系统作用(郭咏琳、周延风, 2021)，为竹编手艺人团体知识融合与跨界创新搭建平台(钟迪茜, 2025)，助力手艺人团体以集体创业行动完成竹编非遗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市场类别拓展；二是合作社带动机制，即新生代传承人成立合作社，带动老一代手艺人参与并受益于非遗产业发展(刘智英等, 2023)，实现手艺人团体的共同富裕。

最后，非遗大众属性是指非遗既起源于大众日常生活，又必须通过广泛使用塑造活态生命力(韩若冰, 2019)。非遗大众属性生态化路径是指将非遗融入乡村，构建非遗与乡村文旅产业双向赋能的生态服务圈(黄永林、邹蓓, 2024)。本路径中，产品导向创业行动侧重将道明竹编非遗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开发出创新且丰富的非遗文旅业态，市场导向创业行动聚焦创造一二三产融合的多元市场，两类创业行动共同构建了开放型乡村发展机会集，带动了乡村多元主体的共同富裕。非遗大众属性生态化路径实施的难点在于创业主体不再局限于手艺人，而是融合了文旅企业、地方政府、新老村民等多元主体，如何形成多元主体协同互补，是乡村迈向共同富裕的主要挑战。本案例发现，非遗乡村全面融合得益于两种机制的保障：一是“多主体高度协同机制”，即政府、高校、文旅企业等外部主体与手艺人、新老村民等创业者形成高度协同网络，政府负责政策和资源支持，文旅企业负责竹艺村的整体规划和运营，而本土创业者则承担业态创新和发展责任；二是“集体经济包容机制”，即通过构建集体经济带动和反哺机制，将乡村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纳入乡村发展中，使其参与并受益于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乡村多主体共同富裕。

(二)乡村共同富裕的农业产业振兴与非遗产业振兴路径比较

农业产业振兴路径依托的是乡村自然资源和农业产业资源，非遗文化产业振兴则依托的是传统文化资源，包括手艺人的集体记忆和技能(郭会斌等, 2023；维登等, 2024)，二者在行动主体、行动路径、行动结果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如表5所示。

第一，在行动主体方面，虽然农业产业振兴和非遗文化产业振兴均强调多主体合作的重要性，但二者在多主体互动关系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农业产业振兴研究重视政府与市场的主导作用(朱竑等, 2023)，而忽略了小农户自身能动性。虽然有研究指出“政府—市场—农户”等多元力量合作的重要性(刘小峰等, 2023)，但“大

政府—小农户”的局面还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与之相比,非遗文化产业振兴路径的行动主体是非遗手艺人、农民和当地农户,政府、高校、企业等外部力量发挥赋能和支持作用,为非遗手艺人和本地农户的创业行动构建支持系统(妥艳娟等,2024),充分激发非遗手艺人和本地农户的内生动力,凸显了本土创业力量的重要性。

第二,在行动路径方面,农业产业振兴侧重关注政府产业政策引导和龙头企业的市场带动路径,强调政府在产业发展规划、质量标准引导、市场主体培育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朱竑等,2023)。当前,不少乡村开展的“一县一品”产业发展工程都有强大的政府和市场助推力(刘小峰等,2023),政府在产业导向和规范方面发挥作用,龙头企业则通过带动农户共同参与产业发展(张德海等,2020;褚庆宜、赵祥云,2023)。然而,本文发现非遗产业振兴路径难以采取类似的路径,原因在于:虽然地方政府在传承政策制定、人才补贴、乡村发展规划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持(丁元竹,2020),但其难以主导非遗产品和市场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因此,非遗产品导向和市场导向的本土创业行动才是推动乡村发展机会集构建的基础,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第三,在行动结果方面,传统农业产业振兴带来的共同富裕结果强调产业品牌塑造和竞争力提升,关注企业和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就业岗位增多(林嵩等,2023;朱竑等,2023)。尽管经济收入指标重要且有效,但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农户在乡村共同富裕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刘培林等,2021)。本研究发现,非遗文化产业在赋能乡村共同富裕过程中不仅逐步提升手艺人和本地农户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手艺人和本地农户的非遗价值认同和文化自信(王泽宇,2025),激发他们在创业过程中不断释放创造力,推动乡村发展机会集的构建与演化,进一步增强当地村民生活幸福感和社区归属感,实现真正的安居乐业。

六、结论和展望

乡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同富裕进程中最重要也最为艰巨的任务(王春光,2021)。当前,关于乡村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现路径尚在理论探索阶段,亟需从特色实践案例中提炼经验证据(徐凤增等,2021)。本文率先关注到部分乡村基于非遗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典型个案,从乡村本土创业视角,构建了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提炼出3条非遗本土创业路径——非遗功能属性产品化路径、非遗创新属性产业化路径、非遗大众属性生态化路径;3类多主体合作机制——多主体松散合作、多主体紧密合作、多主体高度协同;以及3类共同富裕带动机制——创业个体示范机制、合作社带动机制、集体经济包容机制。研究结论从理论层面揭示了非遗赋能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机理,同时对乡村依托非遗资源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求提供了实践启示。

(一)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本土创业路径和关键机制。已有文献大多侧重从农业产业振兴路径探讨乡村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强调其经济带动作用(张德海等,2020;刘小峰等,2023;朱竑等,2023),却普遍忽视了非遗文化产业对乡村共同富裕的经济带动潜力和文化赋能价值。本文发现,非遗不仅可以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实现乡村物质富裕,更能激发手艺人和本地农户的文化自信和认同,增强其内生创业动力,提升生活获得感和幸福感(妥艳娟等,2024)。在创业路径方面,本文指出,本土创业者既需要重视非遗产品创新行动,更要关注市场类别和边界的拓展与重建,突破了以往研究过于关注产品和知识创新的局限(王兆峰、陈勤昌,2023;钟迪茜等,2025),凸显了非遗市场构建的重要性。在关键保障机制方面,本文发现,不同于传统的“大政府—小农户”合作模式(丁元竹,2020;朱竑等,2023),政府、高校和企业等外部主体需要为非遗手艺人和本地农户提供多元化的创业支持,形成以本土创业者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动态合作机制。此外,乡村需要通过创业个体示范、合作社带动和集体经济反哺等措施,持续完善共同富裕带动机

制,激发更多个体参与并受益于乡村发展。研究结论丰富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多元化路径,凸显了非遗资源的战略性作用。

第二,本文对非遗创新性发展研究亦有重要贡献。一方面,先前研究强调西部偏远地区非遗手艺人的能力和认知局限,凸显外部企业“输血式”帮扶的重要性(郭咏琳、周延凤等,2021)。与之相反,本文发现,新生代非遗手艺人具备创新能力和认知优势,能够以创业精神主动探索非遗创新性发展,并带动手艺人团体共同推动非遗产业转型升级,凸显了其内生动力。另一方面,本文将非遗创新性发展置于乡村共同富裕的宏观背景下讨论,拓展了其后果研究。以往研究多聚焦非遗产品创新中的手艺人身份构建和认知更新(潘安成等,2023;维登等,2024)、本地和外部知识的跨界融合(钟迪茜等,2025)以及创新生态系统的搭建(拉斐利等,2019;克罗森、赫根斯,2019),却较少关注非遗创新对乡村的具体影响。本研究发现,非遗产品和市场的创新不仅为手艺人 and 农户带来经济收入,更增强了其文化自信和内生创业动力,使其成为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

第三,本文明晰了非遗本土创业过程中机会集的演化机理,为理解乡村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虽然乡村本土创业文献指出机会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徐凤增等,2021;佩雷多、麦克莱恩,2013),但现有研究对机会集的概念界定较为模糊,尚未明确机会集的属性及其如何推动不同程度的共同富裕。本文指出,机会集的创新性和开放性决定了乡村共同富裕水平:当机会集相对封闭且聚焦于非遗组织生存时,乡村只能实现少数个体富裕;而当机会集聚焦于产业创新和乡村文旅发展时,其创新性和开放性为多元主体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创业和就业机会,进而带动乡村走向共同富裕。乡村共同富裕的本质是让更多人享有公平发展机会(斯晓夫等,2020;刘培林等,2021),本文不仅印证了上述观点,更进一步揭示了机会集异质性对乡村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

(二)管理启示

在国家大力推行共同富裕战略的大背景下,乡村迫切需要找到一条走向繁荣振兴和共同富裕之路。本研究揭示了非遗文化资源的战略性作用,为乡村基于非遗文化资源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启示。

首先,重视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过程中行动主体的多样性。一方面,重视非遗手艺人和本地村民在乡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与农业产业不同,非遗发源于本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其创新性发展势必需要手艺人 and 村民的广泛参与,只有激发非遗手艺人 and 村民的内生创业动力,才能实现非遗文化产业振兴和乡村繁荣富裕。道明竹编非遗实践案例表明,当非遗手艺人 and 村民在创业过程不断意识到非遗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其内生创业动力就会不断增强,因而乡村要为非遗手艺人 and 村民的创业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本土创业力量的成功离不开社会力量的紧密支持和协同,乡村需要通过互补、互利、互能的合作方式,引入高校、企业、新村民等多元主体,实现本土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有机融合。地方政府尤其要注重与艺术高校和外部企业共建非遗跨界创新平台,为高校师生、设计师与手艺人的共创提供政策和资源支持。

其次,识别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动态路径和行动。尽管当前不少乡村意识到非遗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但若不能清晰识别非遗赋能乡村发展的具体路径和行动,盲目将非遗与文旅结合在一起,不仅无法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还对非遗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道明竹编非遗实践案例表明,非遗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遵循非遗从保护继承到产业创新发展再到与乡村文旅相互融合的动态路径,逐步推动非遗与乡村的共同发展。在具体创业行动上,本土创业者不仅要重视非遗产品创新行动,更要重视市场开拓行动。在非遗产品与服务方面,需要在继承和改善传统非遗产品的基础上,对非遗产品类别和文化价值重新界定,使其能够以全新的产品形式和内涵融入乡村业态,唤起大众对非遗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认知与兴趣,构建起愿意为非遗文化内涵付费的消费群体;在市场开拓行动方面,需要在非遗原有市场的基础上,开拓全新的市场类别和边界,使其与乡村文旅市场深度融合形成多元市场。

最后,打通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关键难点和痛点。道明竹编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关键点在于新生代传承人,新生代传承人具有良好的创业创新精神,能够带动传统手艺人共同推动非遗产业转型升级。现实中,很多非遗技艺传承陷入断档,传统手艺人逐渐减少,缺少非遗创新的人才基础。因此,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从制度层面构建非遗传承体系,将非遗技艺学习纳入职业教育体系,建立系统化的技能培养机制,培养和积累

创新人才。此外,找到精准的市场需求是道明竹编非遗从组织生存跃迁到产业创新并进一步融合乡村文旅产业的关键。现实中,不少非遗尚处于艰难生存阶段,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还存在较长的时间周期,为了保障基本的的市场需求,地方政府可将非遗产品加入采购目录,以政府需求带动市场活力。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文遵循严谨的案例研究方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深化。第一,我国非遗种类丰富,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在赋能乡村发展过程中可能呈现不同路径,本文研究的理论模型更适用于手工艺类的非遗项目,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其他类型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差异化路径。第二,由于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无法像多案例或大样本一样具有很高的外部效度,未来研究可以通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或者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方法,深入挖掘我国乡村基于非遗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独特机制。第三,尽管本研究关注的道明竹编发展历程超过10年以上,但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未来道明竹编产业如何带动乡村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还需进一步追踪观察^②。

(作者单位:刘玉焕、彭洋,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尹珏林,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注释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24年数据:我国已构建国家、省、市、县4级非遗名录体系,认定各级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9万多人,其中73%的非遗项目保留在传统乡村。

②中外文人名(机构名)对照:维登(Wiedner);拉斐利(Raffaelli);巴科(Bacco);达尔皮亚兹(Dalpiaz);坎切列里(Cancellieri);帕迪利亚-梅伦德斯(Padilla-Meléndez);里克特(Richter);兰普金(Lumpkin);巴克(Bacq);卡拉米(Karami);里德(Read);佩雷多(Peredo);麦克莱恩(McLean);尹(Yin);乔亚(Gioia);克罗森(Kroezen);赫根斯(Heugens)。

参考文献

- (1)安学斌:《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论纲》,《民族艺术》,2021年第6期。
- (2)蔡莉、鲁喜凤、单标安、于海晶:《发现型机会和创造型机会能够相互转化吗?——基于多主体视角的研究》,《管理世界》,2018年第12期。
- (3)陈龙:《“遗产化”过程中的工匠圈层更迭与意义生产——以“湘南木雕”为例》,《民族艺术》,2023年第1期。
- (4)褚庆宜、赵祥云:《县域统合: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政府行为逻辑——基于陕西省柞水县木耳产业发展经验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23年第4期。
- (5)丁元竹:《“十四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相关政策措施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
- (6)顾江、陈鑫、郭新茹、张苏缘:《“十四五”时期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逻辑框架与战略路径》,《管理世界》,2021年第3期。
- (7)郭会斌、郑耀洲、张景云、王丽媛、刘明昊:《匠心租金的构念、获取路径与演化过程——基于六家“百年老店”的阐释》,《管理世界》,2023年第7期。
- (8)郭咏琳、周延凤:《从外部帮扶到内生驱动:少数民族BoP实现包容性创新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
- (9)韩若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火花、传承与创新——以“情动机制”为视角》,《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
- (10)黄永林、邹蓓:《推动非遗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主要路径》,《文化遗产》,2024年第1期。
- (11)黄永林:《让非遗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2月2日第A01版。
- (12)林嵩、谷承应、斯晓夫、严雨珊:《县域创业活动、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23年第3期。
- (13)刘培林、钱滔、黄先海、董雪兵:《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
- (14)刘小峰、彭扬帆、徐晓军:《选优扶强:老少边区特色农业“一县一业”格局何以形成——盐池滩羊的纵向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3年第7期。
- (15)刘智英、马知遥、刘垚瑶:《非遗工坊的生成逻辑、基本意涵与实践分析》,《民俗分析》,2023年第5期。
- (16)罗必良、洪炜杰、耿鹏鹏、郑沃林:《赋权、强能、包容: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 (17)吕鹏、刘学:《企业项目制与生产型治理的实践:基于两家企业扶贫案例的调研》,《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 (18)潘安成、常玉凡、曹耀:《“父子有亲”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技艺传承性创新的动力机制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23年第3期。
- (19)斯晓夫、严雨珊、傅颖:《创业减贫前沿理论研究与未来方向》,《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
- (20)妥艳娟、吴建坤、白长虹、陈曦、刘开:《“国民小吃”怎样炼成幸福产业?——创造力驱动的沙县模式研究》,《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 (21)王春光:《迈向共同富裕—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行动和路径的社会学思考》,《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
- (22)王凤彬、张雪:《用纵向案例研究讲好中国故事:过程研究范式、过程理论化与中西对话前景》,《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
- (23)王晓光、赵珂:《文化遗产数字叙事信任模型:概念与框架》,《文化遗产》,2024年第3期。
- (24)王心蕊、黄雅妮、黄凯洁:《社会创业推动下乡村旅游地共同富裕形成机制研究》,《旅游学刊》,2023年第7期。
- (25)王泽宇、周翔、王增文、王英奇、邓智平:《乡村品牌身份重构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基于贵州“村超”的探索性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5年第2期。
- (26)王兆峰、陈勤昌:《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特质、传承挑战与活化路径》,《旅游学刊》,2023年第6期。

- (27)邢小强、汤新慧、王珏、张竹:《数字平台履责与共享价值创造——基于字节跳动扶贫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12期。
- (28)徐凤增、裘威、徐月华:《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一项双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12期。
- (29)雍旻、刘伟、邓睿:《跨越非正式与正式市场间的制度鸿沟——创业支持系统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作用机制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
- (30)张德海、傅敬芳、陈超:《现代农业价值共创:社会动员与资源编排——基于新会陈皮产业的案例观察》,《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8期。
- (31)钟迪茜、卢颖、罗秋菊:《从陶瓷生产中心到文化创意旅游地——知识视角下的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当代复兴与创新》,《旅游学刊》,2025年第1期。
- (32)周立、奚云霄、马芸、方平:《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基于公共治理说的陕西袁家村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期。
- (33)朱竑、陈晓亮、尹铎:《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阶段、路径与制度研究》,《管理世界》,2023年第8期。
- (34)庄晋财、黄曼、程李梅:《中国乡村创业理论构建与未来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23年第1期。
- (35)Bacco, F. and Dalpiaz, E., 2022, “The Perfume of Traditions: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Extinct Societal Traditions”, in Lockwood, C. and Soublie, J. F., eds: *Advances in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Bingley, U.K.: Emerald Publishing, pp.13~136.
- (36)Cancellieri, G., Cattani, G. and Ferriani, S., 2022, “Tradition as A Resource: Robust and Radical Interpretations of Operatic Tradition in The Italian Opera Industry, 1989–2011”,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43(13), pp.2703~2741.
- (37)Gioia, D. A., Corley, K. G. and Hamilton, A. L., 2013, “Seeking Qualitative Rigor in Inductive Research: Notes on the Gioia Methodology”,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Vol.16(1), pp.15~31.
- (38)Karami, M. and Read, S., 2021, “Co-Creative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36(4), pp.106~125.
- (39)Kroezen, J. and Heugens, P., 2019, “What is Dead May Never Die: Institutional Regeneration Through Logic Reemergence in Dutch Beer Brewing”,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64(49), pp.976~1019.
- (40)Lumpkin, G. T. and Bacq, S., 2019, “Civic Wealth Creation: A New View of Stakeholder Engagement and Societal Impact”,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Vol.33(4), pp.383~404.
- (41)Padilla-Meléndez, A., Plaza-Angulo, J., Del-Aguila-Obra, A. and Ciruela-Lorenzo, A., 2022,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Lines”,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Vol.34(1), pp.6~31.
- (42)Peredo, A. M. and McLean, M., 2013, “Indigenous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Captivity of Entrepreneurship”, *Business & Society*, Vol.52(4), pp.592~620.
- (43)Raffaelli, R., 2019, “Technology Reemergence: Creating New Value for Old Technologies in Swiss Mechanical Watchmaking”,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64(3), pp.576~618.
- (44)Richter, R., 2019, “Rural Social Enterprises as Embedded Intermediaries: The Innovative Power of Connecting Rural Communities with Supra-regional Network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70, pp.179~187.
- (45)Wiedner, R., Dacin, M. T. and Furnari, S., 2024, “Custodianship Across Generations: Preserving the Practice of Vinyl Record Manufactur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67(6), pp.1428~1462.
- (46)Yin, R. K., 201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Research on the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of Empowering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of Daoming Bamboo Weaving

Liu Yuhuan^a, Peng Yang^a and Yin Juelin^b

(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b.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ostering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Existing studies primarily focus on the driving for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rural prosperity and revitalization, overlooking the path and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tributes to common prosperity. This longitudinal study examines the innovativ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aoming Bamboo Weaving" and demonstrates how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ignificantly bolsters rural prosperity through indigenous entrepreneurial endeavor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rocess model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villages empowered b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dentifying three distinct local entrepreneurial action paths: the product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unctional attribut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novation attributes, and the ecolog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ublic attributes. It emphasiz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xtended organizational survival opportunity set, focused industrial innovation opportunity set, and open rur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set in linking local entrepreneurial actions with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Furthermore, it describes the dynamic trajector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mpowered villages from individual and group prosperity to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provides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endogenous paths of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esent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leverag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achieve rural development goals.

Keywords: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ural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Daoming bamboo weaving